



裕仁“罪己诏”辨

蒋立峰

日本《文艺春秋》2003年7月号刊登了一篇《昭和天皇向国民谢罪诏书草稿》(以下简称《诏书草稿》),并称此举为“发现了有冲击性的历史性文件”。这篇《诏书草稿》全文如下:

朕即位以来兹有二十余年,虽夙夜恐背祖宗及万姓而自勉之,然形势之所趋终不能改,先失善邻之谊,后与列强媾事,遂止于悲痛之战败,招致今日甚烈之惨祸。时念及无数暴尸战场、毙命职域之人及其遗属,实为痛心而不能禁。又负伤蒙灾或身留异域、失产于外地者亦不计其数,加之一般产业之不振、各种物价之暴涨、衣食住等陷于窘迫,亿兆困苦涂炭,诚为国家前所未有之灾难。静而思之则忧心如焚。朕之不德,深愧天下。身居九重而自感不安,置心于万姓而感于背负之沉重。然而,当今正面临罕有之巨变,天下犹骚然不止。如急于止身洁己而忘国家百年之忧、偷一日之苟安,实为不负责任。以此鉴于内外之形势,而欲挺身面向艰难,修德嫁祸,行善攘灾,誓致力于国运之再建及国民之康福,以谢祖宗及万姓。亦请女体国民,体谅朕意,明察内外形势,同心协力,各尽其天职,以克服非常之时局。弘扬国威。

一、《诏书草稿》之由来

据该杂志同期刊登的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理事加藤恭子《解读被封存的诏书草稿》一文介绍,作者加藤曾为1948年6月至1953年末任日本宫内府(1949年6月以后改称宫内厅)长官的田岛道治撰写传记《田岛道治——为昭和“奉公”的生涯》,为此从田岛家借阅了当年田岛收藏的有关天皇及政局的大量文献资料和书籍,从众多的书信文件中发现了这份《诏书草稿》。从该杂志刊登《诏书草稿》全文时配发的背景照片看,这个文件应是田岛任宫内府长官时为天皇裕仁起草的“罪己诏”草稿,由于未能公开问世而尘封于起草人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中。

根据加藤文章所述,田岛1885年生于名古屋,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职于爱知银行,曾任铁道院总裁后藤新平的秘书。1920年出任爱知银行常务董事1927年金金融危机开始后,有36家银行停业。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将田岛招至东京,命他为新组建的昭和银行总经理以统合这些停业银行的业务。1938年9月辞职开办明协学寮。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田岛先后任日本银行参事、大日本育英会会长,1948年6月就任宫内府长官,翌年宫内府改为宫内厅后任宫内厅长官。此后还出任过索尼公司的监察、会长、顾问等职。田岛身无爵位而就任宫内府长官,乃因首相芦田均寄予厚望,及密友安倍能成、小泉信三等人的劝说而为之,但也因此受到宫内保守势力的阻挠。田岛对宫中事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削弱了侍从和后宫的一些权力,将权力集中于长官和次官,并任命小泉信三负责对皇太子的教育工作。至为重要的是,裕仁起初对田岛出任宫内府长官似乎不甚高兴。

究其原因,一是裕仁对同时更换宫内府长官和侍从长不满,二是田岛在就任宫内府长官前,与东京大学总长南原繁、驻美国大使堀内谦介等人一起主张裕仁退位,《芦田日记》对此有所记载。但是,裕仁似乎多虑了。田岛就任宫内府长官后很快转变了观点,即由主张裕仁退位变成反对裕仁退位。《芦田日记》对此变化的记载是:田岛在宫中工作三个月后,明白了裕仁并无退位的意思。但裕仁此举并非出于个人目的,而是认为在位是为重建日本尽责尽力的最好途径。田岛认为裕仁是无私诚实之人,对身边供职的人皆信而用之。

田岛还认为,裕仁退位不仅不利于维持天皇制,说不定会引起天皇制动摇。何况若裕仁退位,皇太子尚年幼,并无适宜于摄政的人选。在详细阅读了《田岛日记》和田岛当年保存下来的大量关于宫廷内活动的文献资料后,加藤认为,随着在宫中工作时间的推移,田岛产生了将裕仁对于战争的真实感情直接传达给国民的强烈愿望。正是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田岛数次起草了意欲转达裕仁意愿的发言稿。

在一篇似乎是《宫内府长官谈话》的文稿中,田岛写道:天皇陛下为满洲事变以来为皇国或暴尸于战场、或殉身于职场的千万人及其遗属而常哀肠寸断,又对战争受伤者、蒙受灾难者、撤回国内者、尚未撤回国内者及其家属等因战争而直接付出牺牲者,以及因产业荒废、物价腾贵、生活物资匮乏等而衣食住陷于窘迫、面临涂炭之苦的全体国民日夜挂念在心。且招此未曾有之灾殃虽乃时势之所趋难以制止,但陛下感到因自己之不德所至,上而愧对祖宗,下则难对国民。如此陛下虽身居皇宫,其心常在国民而无片刻之安。且方今世界之大势犹骚然不止,国内亦处于诸事革新之困难之际,思潮对立,纲纪废弛,观此内外形势,终不许陛下对国家百年之忧等闲视之而急于洁身自好。故陛下决心迈入此至难之荆棘之途,依照大义名分,遵从人心所向,与国民一起劳心苦志,直面艰难,再次体现接受四国宣言时所云“自身怎样无所谓”之令人敬畏之旨意,超越舆论,为重建日本竭尽全

力，以尽象征之本分，以报答因战争而牺牲的人们。我等应体察国家之象征、国民统合之象征、陛下之崇高的牺牲精神，为重建日本共同奋发而起，戮力同心，誓扶持恢弘国运不已。虽无法准确判断田岛欲在何时、何种场合使用这篇事先准备好的谈话稿，终因1948年10月7日芦田内阁集体辞职而未能派上用场。然而，从这篇谈话稿不难看出田岛欲向日本国民传达裕仁的歉疚之情的急切心情，谈话虽未进行，但田岛此后在此谈话稿的基础上反复推敲润色，终于以裕仁为第一人称的口吻拟就上述《诏书草稿》。

二、《诏书草稿》与裕仁

加藤在其文中称此《诏书草稿》为“冲击性”文献，此文件的公布必将根本改写昭和史中的重要一页。但是，通观其文，并没有关于裕仁与此《诏书草稿》有直接关系的任何说明，只是以间接陈述作为旁证来说明裕仁“君德”何等高尚，而田岛是否在裕仁命令或授意下写成这篇《诏书草稿》则很难做出明确结论。根据侍从村井长正的证言，他亲眼看到裕仁对过去的战争是何等苦恼。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后，其苦恼更甚，甚至流露出退位的想法。迨至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对25名甲级战犯做出判决时，裕仁难过地哭肿了眼睛，12月23日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时，裕仁明确向三谷隆信侍从长表示想要退位。

进入1949年，村井找到田岛说，裕仁应以发布诏书的形式表示谢罪，向世界、向亚洲、向日本做出交待。田岛则表示与村井想法相同，他也明白陛下的心情，而且已经写出了诏书的草稿。据此推断，田岛起草诏书的时间应在1948年秋冬之际。加藤断言，如此事关重大的诏书，如果不受命于裕仁，田岛是不会擅自起草这类诏书的。但这一说法尚无确切的证据。退一步讲，即使是裕仁直接命令田岛起草谢罪诏书，则裕仁此举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其真实意图主要不在于向国内外表达忏悔之意，而是要对受到了正义制裁的甲级战犯及其他战犯的可耻下场表达悲悯之情，以此收揽民心，稳定国运。

三、《诏书草稿》的结局

裕仁的“罪己诏”最终未见天日，《诏书草稿》只能作为一个非正式的、仅具参考意义的文件而尘封于历史的记录中。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开始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即由限压日本改为扶持日本，尤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政治格局，美国急欲把日本变成东亚反共、抗共的基地，这就需要稳定、发展的日本，裕仁的可利用价值因此大大提高。美国开始推进解决缔结对日和约问题，企图以此促使日本加速回归国际社会，以增强西方阵营的力量。在日本国内，由于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整肃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半途而废，民主改革已被加强资产阶级专政所取代。显然，无论裕仁现在有何想法，既不会再有人议论让他退位之事，也不会再有人要求他颁布罪己诏以平民怨、收民心（反对天皇制的革新派当然不在此列）。尽管田岛仍然坚持裕仁应责己谢罪，但已难以得到支持了。

从1951年8月9日至1952年3月6日，田岛为起草裕仁将在1952年5月3日和约生效暨宪法实施五周年纪念仪式的致辞而忙碌，他按照裕仁的意思在讲稿中写有意为“承担战败责任，向国民深表道歉”的话如下：战争惨祸甚大，思想混乱，经济动摇，一般民众之不安疾苦亦不可名状。一念及此，实忧心如灼，菲德未能阻之于未然，深感愧对祖宗与万姓。这显然与《诏书草稿》中的提法如出一辙，但程度有所降低。尽管如此，田岛将写成的讲话稿数次递交给吉田茂首相和裕仁身边之人，仍总是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他们认为“时至今日还要陛下谢罪真是可笑”，这样做将会引起战争责任问题和天皇退位等棘手问题。在和约生效、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时刻，天皇没有必要强烈表现悔恨、谢罪之意，天皇讲话应成为日本走上独立之路、面向未来的贺词。吉田首相提出的另案得到了包括小泉信三、安倍能成等人在内的多数人的支持。结果5月3日裕仁在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对于过去只是说“对战争造成的无数牺牲者再次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同情”，已经很难说有多少谢罪的成分包含在其中。（以上各处引文均转引自加藤恭子前引文）

四、《诏书草稿》现世之意义

同样是《文艺春秋》，在1990年第12期刊载了一份同是关于裕仁的重要历史文件——《昭和天皇自白录》。这是裕仁于1946年3、4月间向宫内府大臣松平庆民等人发表谈话的记录，1988年被记录者的后代发现并同意公布于世。裕仁在《自白录》中对田中义一内阁以来的许多重要问题做出回顾和解释，颇具权威性，也无人能否定其真实可靠性。曾对裕仁推崇备至的普通日本国民看到《自白录》后，对裕仁“以私情严重干预倒阁而大吃一惊”，昔日其崇高、神圣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历史学者则因此对昭和史的研究进行反省，那种通过“解释”法律和“研究”立宪君主制将战败前的天皇裕仁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架空，从而使研究天皇问题成为禁区，以此为当代的天皇制和国家政治服务的做法受到了质疑。《自白录》是明确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的最有说服力的史料，那些企图为裕仁开拓战争罪责的文人墨客面对《自白录》只有哑口无言。日本昭和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因此而需要改写。而《文艺春秋》这次刊载的《诏书草稿》，则无法与《昭和天皇自白录》相比。如上所述，此《诏书草稿》不似《自白录》，并非裕仁亲笔写成或是其口述记录，而是由裕仁授意、他人揣摩其意后写成。于是，裕仁如何授意、《诏书草稿》能否反映裕仁的本意都成了问题。

由于缺少其他过得硬的资料佐证，目前充其量只能说《诏书草稿》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裕仁的想法和愿望。而且从当时的形势分析，裕仁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谢罪而在“丢”帅保车”。在1945年日本刚刚战败投降时，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都认为裕仁是战犯，应绳之以法，日本国内要求裕仁退位的呼声也很强烈。9月27日，裕仁前往盟军司令部会见麦克阿瑟，表示“对战时国民在政治、军事方面所做的一切决定和行动负全部责任，我自己接受你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决”。裕仁企图以自己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式来解救手下于万一。此后当他的爱将纷纷被处决或判刑时，眼见“保车”不成，惟有痛心疾首，颁布一个罪己诏或许能多少减轻心灵痛苦。所以，即使《诏书草稿》当年能以罪己诏的形式公之于世，其意义亦有限。今日公开《诏书草稿》则只能是为裕仁研究和日本昭和史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资料而已。

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版了一些关于天皇及天皇制的书，而且其中不乏西方学者写的书，但明确指出裕仁作为法理上的最高统治者应承担战争责任的却不多见，即或提到这一点，也是语气委婉，表达缓和，似乎战争期间的裕仁仍不失为一位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再联系到当前日本的政治发展趋势，《文艺春秋》渲染《诏书草稿》应引起我国的日本近代史和当代日本政治研究者的注意。

发表于《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 ijs@cass.org.cn